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14

加洛林时代 史学成就研究

朱君杙 著

JIA LUO LIN SHI DAI
SHI XUE CHENG JIU YAN JIU

Shijiewenmingshiyanjiucongshu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14

加洛林时代 史学成就研究

朱君杙 — 著

JIA LUO LIN SHI DAI
SHI XUE CHENG JIU YAN JIU

Shijiewenmingshixianjiucongshu 

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

©朱君杙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洛林时代史学成就研究 / 朱君杙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205-08237-6

I. ①加… II. ①朱… III. ①加洛林王朝—史学史—
研究 IV. ①K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2793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印 张: 16.75

字 数: 24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维宁

装帧设计: 先知传媒·杨小雪

责任校对: 吴艳杰 等

书 号: ISBN 978-7-205-08237-6

定 价: 35.00 元

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的汉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3 & ZD103）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加洛林时代”持续时间大约三个世纪之久，几占西欧中世纪早期历史的三分之二，为西欧封建社会乃至西方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加洛林时代，由于受到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推动，史学编纂事业出现了被麦克特里克称之为“史学革命”^①的积极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史学作品的数量、编纂体例、纪年方法、修史机制、文风等诸多方面。

第一，从数量上看，加洛林时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时代

公元800年之前的西欧大陆只有1800部手抄书籍或残篇流传下来，然而公元800年至900年的西欧大陆却有9000多部手抄书籍或残篇流传了下来。^②其中，历史著作汗牛充栋，影响力较大的有：《741年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741*）、《维埃纳的阿多编年史》（*The*

① Matthew Innes and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s.,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93.

② Marios Costambeys, Matthew Innes and Simon MacLean,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6.

chronicle of Ado of Vienne)、《弗莱库尔夫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Freculf*)、《都灵的克劳迪乌斯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Claudius of Turin*)、《普鲁姆的勒斋诺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Regino of Prüm*)、《王室法兰克年代记》(*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圣伯丁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 Bertin*)、《富尔达年代记》(*The annals of Fulda*)、《圣瓦斯特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Vaast*)、《古梅斯年代记》(*The earlier annals of Metz*)、《兰斯的弗洛达尔德年代记》(*The annals of Flodoard of Reims*)、爱因哈德(Einhard)的《查理大帝传》(*The life of Charles the emperor*)、结舌者诺特克(Notker the Stammerer)的《查理大帝传》(*The deeds of Emperor Charles the Great*)、提甘(Thegan)的《虔诚者路易传》(*The deeds of Emperor Louis*)、“天文学家”(The Astronomer)的《虔诚者路易传》(*The life of Emperor Louis*)、埃默尔达(Ermoldus)的《向虔诚者路易致敬》(*In honor of Louis*)、执事保罗(Paul the Deacon)的《梅斯历代主教传》(*The deeds of the Bishops of Metz*)、《伦巴德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Lombards*)、安德里亚斯·阿格尼拉斯(Andreas Agnellus)的《拉文纳历代主教传》(*The deeds of the Bishops of Ravenna*)、尼萨德(Nithard)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On the dissensions of the sons of Louis the Pious*)、帕斯卡修斯·拉特伯都(Paschasius Radbertus)的《阿德尔哈德和瓦拉传》(*The lives of Adalard and Wala*)。

第二，加洛林时代在历史著作的纪年方法上取得了进步，加洛林时代的历史著作广泛采用更加方便的公元纪年法

在此之前，地中海世界的各个地区盛行多种形式的纪年方法，如以前776年为起点、四年为一个周期的奥林皮亚德纪年法(Olympiad)，以罗马建城的前753年为起点的纪年法，以执政官任期来纪年的纪年法。4世纪还出现了以十五年历(Indiction)来纪年的方法。这种纪年法以297年为起点，十五年(十五年为一个征税周期)为一个纪年单位。由于历史著作的纪年方法不统一，推算不易，很难形成一个清楚的历史概念。6世纪斯基泰(Scythian)的修士迪奥尼修斯·埃格西乌

斯 (Dionysius Exiguus) 在计算复活节周期的时候最先提出了以耶稣基督诞生之年纪年的公元纪年法。而最早在历史著作中采用公元纪年法的是盎格鲁-萨克逊 (Anglo-Saxon) 的修士比德 (Bede), 他在编写论著《关于日期的认定》(*On the reckoning of time*) 中大事记 [这一大事记在后世独立成书, 被称为《大编年史》(*Greater Chronicle*)] 的时候, 采用了公元纪年法。后来盎格鲁-萨克森的传教士们将比德的著作传入了欧洲大陆, 从而使法兰克人接触了公元纪年法。在加洛林时代公元纪年法取代了其他的纪年法, 这不仅大大简化了纪年方法, 而且也实现了历史著作纪年方法的统一, 这是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三, 原有的史学体裁在加洛林时代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如世界编年史 (world chronicles)、圣徒传

4 至 5 世纪, 随着基督教会势力的壮大, 教会史学逐渐兴起。其中, 编年史是教会史学的一种重要的体裁形式。3 世纪时, 绥克斯图·朱利乌斯·阿非利加纳 (Sextus Julius Africanus) 最早将古典时代各个民族和各位君王的往事以及他们被罗马帝国取代的过程, 按照编年的方式记载了下来, 形成了最早的世界编年史。4 世纪时, 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又以《阿非利加纳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Africanus*) 为底本, 创作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尤西比乌斯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Eusebius*)。这部世界编年史后被哲罗姆 (Jerome) 译为拉丁文。尤西比乌斯—哲罗姆的编年史为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家提供了一种模仿或续写的摹本, 影响极其深远。世界编年史具有叙述时空范围较大, 所记内容跨越古今各国的特点, 也就是说这种体裁形式试图总揽古今各个民族的历史。同时世界编年史也是基督教色彩浓厚的著作, 修撰它们的史家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救赎的过程, 这一过程开端于人类的堕落, 终结于末日审判, 因而世界编年史在时间架构上呈一线型, 并且大多从“上帝创世”开始记叙历史。^① 世界编年史透过这种一线型

① 多萝西娅·冯·登·布林肯 (Dorothea von den Brincken) 曾将公元 3 至 10 世纪基督教世界修撰的 32 部详实的“世界编年史”全部列入表格, 进行统计, 结果除了两部例外, 其余的都从创世纪开始记叙历史。

的时间架构展现上帝的神意,体现上帝在历史中的主权地位。在叙述模式方面,中世纪早期的世界编年史大多遵循两个末世论的叙述模式——“四大帝国”(the four empires)和“六个时代”(the six ages)^①,这两种叙述模式都是一线的,不断靠近世界的终点——末日审判。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拉丁化西方原有的编年史传统延续了下来,一方面,《尤西比乌斯—哲罗姆编年史》被接二连三地续编,另一方面,不少编年史家模仿尤西比乌斯—哲罗姆的摹本创作新作。7世纪中叶在墨洛温王朝统治的法兰克王国,弗利德伽以《尤西比乌斯—哲罗姆编年史》为摹本修撰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弗利德伽编年史》。而在修史活动如火如荼的加洛林时代,加洛林帝国的不少精英都是尤西比乌斯—哲罗姆、比德所著世界编年史的忠实拥趸,他们以尤西比乌斯—哲罗姆、比德的世界编年史为范本,修撰了不少世界编年史著作。其中较为知名的包括:《都灵的克劳迪乌斯编年史》、《利雪的弗莱库尔夫编年史》、《维埃纳的阿多编年史》、匿名者修撰的《741年的编年史》、《普鲁姆的勒斋诺编年史》。不过,加洛林时代的编年史家并没有机械地模仿,他们也有所创新,某些编年史家在继续沿用尤西比乌斯世界编年史摹本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法兰克王/帝国盛行的史学体裁——年代记的某些形式,如公元纪年、逐年记事。

4世纪,随着基督教会势力的壮大,地中海世界的圣徒崇拜日益盛行,圣徒传(hagiography)这一史学体裁也应运而生,最早的圣徒传通常以殉道的教徒为传主,如尤西比乌斯的《巴勒斯坦殉教者传》(*The martyrs of Palestine*)、《古代殉教者传集》(*a collection of martyrdoms of ancient*)。4世纪,由于隐修制度在地中海世界的盛行,那些离群索居的修道士也开始成为了圣徒传的传主,如360年前

① “四大帝国”的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在末日来临之前要经历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四个帝国,罗马是尘世最后一个帝国,届时,罗马帝国也将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基督为王的永恒王国。“六个时代”的理论依据《旧约·创世纪》上帝在六天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第七天休息的叙述,认为人类历史也相应地分为六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从亚当开始一直持续到诺亚;第二个时代从诺亚一直持续到亚伯拉罕;第三个时代从亚伯拉罕一直持续到大卫王;第四个时代从大卫王到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第五个时代从巴比伦之囚到耶稣基督的降临;第六个时代从基督降临到世界的末日。关于“四大帝国”和“六个时代”的理论,参见刘林海:《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分期理论及其特点》,《史学史研究》(北京)2011年第二期。

后，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阿萨内修斯（Athanasius）为隐修制度的首倡者、埃及的修道士安东尼修撰了一部传记——《安东尼传》（*The life of Anthony*）。《安东尼传》后被译为拉丁文，并对拉丁化的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波城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正是受此部传记的熏陶方才投身教会的。396年前后，一位学识渊博的俗人苏尔比基乌斯·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又以《安东尼传》为摹本，以图尔的主教马丁为传主，修撰了一部圣徒传——《图尔的圣·马丁传》（*The life of St. Martin of Tours*）。苏尔比基乌斯·塞维鲁的《图尔的圣·马丁传》开创了一种新形式的圣徒传，这种圣徒传以某位“圣洁贤明”的主教为传主，在《图尔的圣·马丁传》问世后的几十年间，一系列类似的圣徒传如《米兰的安布罗斯传》（*The life of Ambrose of Milan*）、《希波的奥古斯丁传》（*The life of Augustine of Hippo*）、《萨拉米斯的埃比法尼乌斯传》（*The life of Epiphanius of Salamis*）、《加沙的波菲利传》（*The life of Porphyry of Gaza*）相继涌现。5至7世纪中期，圣徒传的这几种形式在整个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扩散，从爱尔兰到亚美尼亚，从法兰克王国的北疆到北非都能寻觅到圣徒传的踪迹。在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圣徒传的创作达到了鼎盛的程度。这是由于这一时期法兰克王国教堂和修道院数量激增的缘故，教堂、修道院为了提高本堂或本院的知名度，招徕更多的信徒，纷纷为本堂或本院的圣徒修撰传记。墨洛温时代，影响力较大的圣徒传有：《圣·格特鲁德传》（*The Life of St. Geretrud*）、《鲁昂主教奥多因传》（*The life of Audoin, Bishop of Rouen*）、《里昂主教阿曼德传》（*The deeds of Aunemund*）、《莱奥德加尔受难录》（*The suffering of Leudegar*）、《普罗加多受难录》（*The suffering of Praejectus*）。加洛林王朝取代了墨洛温王朝之后，尽管法兰克王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圣徒传的创作并未受到影响。加洛林时代仍然是圣徒传创作较为活跃的一个时代。加洛林时代影响力较大的圣徒传有：执事保罗（Paul the Deacon）的《圣·安布罗斯传》（*The life of St. Ambrose*）、阿尔昆（Alcuin）的《圣·威里布洛德传》（*The life of St. Willibrord*）、富尔达修道院住持爱吉尔（Eigil of Fulda）的《圣·斯图密传》（*The life of St. Sturm*）、维埃纳主教阿多

(Ardo of Vienne) 的《阿尼亚纳的圣·本尼迪克特传》(*The life of St. Benedict of Aniane*)、富尔达的修士鲁道夫(Rudolf of Fulda)的《圣·雷欧巴传》(*The life of St. Leoba*)、留得加(Ludger)的《圣·格雷戈里传》^①(*The life of St. Gregory*)、安斯卡(Ansgar)的《圣·威里哈德传》(*The life of St. Willihard*)、麟伯特(Rimbert)的《圣·安斯卡传》(*The life of St. Ansgar*)、明斯特主教奥特弗里德(Altfried of Münster)的《圣·留得加传》(*The life of St. Ludger*)。

第四, 加洛林时代出现了年代记(annals)、历代主教传(deeds of bishops)、历代住持传(deeds of abbots)等新的史学体裁

上古时代, 许多民族都有逐年记载历史的习惯, 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君王们均曾持续保有这种习惯, 罗马时代, 执政官名录(the lists of the consuls)也致使一种原始的逐年记载历史的习惯得以形成。但依照公元纪年来确定日期, 记载历年事件的方法却是加洛林时代新出现的。依照这种方法写成的历史著作被称为年代记。年代记是中世纪早期修道院文化的典型产物, 它是由修道院中的复活节年表逐渐演变而来的。修士修撰年代记的目的在于构建本修道院的历史记忆, 使本修道院的修士们能够获得某种历史认同感, 情感上找到某种历史寄托。在查理曼统治时期, 由于查理曼懂得年代记的重要性, 故而要求每所修道院都把当时历年的大事, 尤其是各修道院附近的事情记载下来, 因此年代记的数目增加得很快。这种由修道院修撰, 内容局限于修道院一地, 叙事极为简练的年代记被称为修道院年代记或小年代记。而788—843年, 法兰克王/帝国又出现了由王室祈祷堂教士修撰的官修年代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②, 官修年代记的出现与一个以亚琛新宫殿为中心的, 由查理曼创立的大型朝廷的出现密不可分。自虔诚者路易统治的末年起, 法兰克帝国陷入了内战和分裂的混乱之中, 帝国宫廷以及宫廷教士们的活动都发生了剧变, 王室祈祷堂教士修撰官修年代记的活动也于843年戛然而止。自此之后, 尽管一批与官修年代记相类似的内容详实

① 这里的格雷戈里是乌特勒支圣·马丁修道院的住持。

② 除了《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之外, 《圣伯丁年代记》830—843年的年代词条也属于官修性质。

的大年代记（如《圣伯丁年代记》、《富尔达年代记》、《圣瓦斯特年代记》）仍然涌现于西法兰克王国及东法兰克王国，不过与修撰于宫廷中的官修年代记相比，这些年代记作品只是一些个人修撰的私家史著，并不具有官修的属性。而且它们也不像官修年代记那样关注整个法兰克王/帝国，它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西法兰克王国或东法兰克王国，如《圣伯丁年代记》、《圣瓦斯特年代记》以西法兰克王国作为自己叙述的重点，《富尔达年代记》以东法兰克王国作为自己叙述的重点。年代记修撰方面的这一特点反映了843年以后法兰克帝国政治分裂的事实。

加洛林时代涌现的另一种史学体裁是历代主教传或历代住持传。历代主教传、历代住持传是模仿罗马的《历代教皇传》(*Liber Episcopalis*)而形成的一种史学体裁，是对主教区或修道院历代执掌者业绩的记录。它的始创者是执事保罗，执事保罗最早从《历代教皇传》中汲取灵感，将《历代教皇传》的写作模式应用到主教传的创作中，修撰了《梅斯历代主教传》。之后这种新体裁广为流行，拉文纳(Ravenna)、勒芒(Le Mans)、圣·万德里耶(St Wandrille)、圣·高尔(St Gall)、欧塞尔(Auxerre)、兰斯(Rheims)、圣·伯丁(St Bertin)等主教区或修道院纷纷撰写自己的历代主教传或历代住持传。

第五，官修史书的活动在加洛林时代大为盛行

修史是丕平家族长期鼓励和扶植的一项文化事业。早在墨洛温时代，矮子丕平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Childebrand)伯爵及其子尼伯龙根(Nibelung)伯爵就曾资助一位匿名的编者修撰了《弗利德伽编年史》的第二部续书。751年，矮子丕平开创了加洛林王朝，丕平家族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王族，从而掌握了更多鼓励和扶植这项事业的资源。查理曼曾下旨将其颁布的法令妥善保存，将罗马教皇以及拜占庭皇帝致他本人及其父亲和祖父的信函汇编成册，即著名的《加洛林书信集》(*the Codex Carolinus*)。他大概还下令宫廷誊抄了《历代教皇传》(*the Liber Pontificalis*)，可能执事保罗所修撰的《梅斯历代主教传》(*the*

Deeds of the Bishops of Metz) 也曾得到了查理曼的恩准。^① 自 778 年之后, 位于亚琛宫廷的王室祈祷堂成为了修撰官方年代记的常设机构, 在王室祈祷堂任职的王家御用教士们每年都要记录当年所发生的大事, 从而形成了官修的年代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至于查理曼是否下令修撰《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一书, 尚不确定。但从为后代子孙保留一部记录和为自己那些官员提供一部资政文献的角度考虑, 查理曼很可能对修撰此书持鼓励的态度。^② 加洛林时代的宫廷是一个修撰历史的重要场所, 除了官修年代记之外, 一些帝王传记 (the royal biography) 也被修撰于此, 如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爱因哈德在查理曼的宫廷中任职, 是查理曼的贴身幕僚, 深受查理曼的宠信, “天文学家”可能是虔诚者路易宫廷中的一位教士, 任职于皇室祈祷堂。他们二人都与自己的传主长期接触, 对传主的方方面面十分熟悉, 有条件将传主刻画得丰满、传神。不过, 由于传主是他们的主君, 他们出于感恩或讨好的目的, 对传主往往只溢美不扬丑, 对传主的政敌则痛加谴责, 使自己修撰的传记成为了带有明显党派倾向性的作品, 如爱因哈德将查理曼描绘成一位少见的完人, 使《查理大帝传》成为了一首只溢美不扬丑的颂歌, 而“天文学家”则在《虔诚者路易传》中公开抨击罗泰尔, 不遗余力地拥护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

加洛林时代的许多历史著作虽然属于私人修撰的性质, 但却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它们的修撰者与王 / 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者接受丕平家族的供养, 于宫廷之中修撰了这些著作 (典型的如执事保罗的《伦巴德人史》、《梅斯历代主教传》), 或者是在丕平家族的直接授意之下修撰了这些著作, 如《弗莱库尔夫编年史·下卷》是弗莱库尔夫奉太后朱狄丝 (Judith) 之命为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编修的教材, 再如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是秃头查理授意尼萨德修撰的, 秃头查理在 841 年 5 月占据夏龙 (Châlons) 城之前, 要求尼萨德将他们那

①Bernhard Walter Scholz,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1970, p. 3.

②Bernhard Walter Scholz,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1970, p. 4.

个时代的各种事件全部记录下来，以此向后世的子孙们表明秃头查理及其党人是如何看待这场内战的起因及意义的，因而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是一部官方认可的、带有党派倾向性的史著。还有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是东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查理三世（绰号“胖子”）授意结舌者诺特克修撰的，883年查理三世莅临圣高尔修道院，授意该院的修道僧结舌者诺特克为其高祖查理曼修撰一部传记，结舌者诺特克秉承王命修撰了这部《查理大帝传》。

丕平家族对于修史活动的鼓励和扶植为加洛林时代史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正是由于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的组织，法兰克王/帝国的宫廷中方才出现了修撰官修年代记的常设机构——王/皇室祈祷堂，官修年代记的活动方才持续了五十余年（公元788年至843年），840年虔诚者路易驾崩后，“人亡政息”，随着法兰克帝国的衰落和解体，其官修年代记的活动也就此终止。其次，由于有王/皇室的支持，修史者获得了比较优渥的物质条件，无衣食之虞，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修史活动之中，加洛林时代不少知名的史家是宫廷中的御用文人，如执事保罗、爱因哈德、“天文学家”、瓦拉弗里德。第三，由于有王/皇室的支持，修史者可以凭借权势获得某些珍贵的宫廷记载与官方档案，在史料的掌握方面，无疑享有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例如，“天文学家”在修撰《虔诚者路易传》的时候，利用自己皇室祈祷堂教士的身份进入了皇宫档案馆，摘录了那里存放的珍贵史料，其中有现已失传的由修道僧阿德马尔（Ademar）所记录的虔诚者路易在阿奎丹宫廷中生活的实录。^①“天文学家”在《虔诚者路易传》的序言中指出有关虔诚者路易早年的史事确系抄自阿德马尔的叙述，他写道：“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虔诚者路易已然身为皇帝，我只得把那位极为高贵且充满奉献精神修士阿德马尔的叙述补充至本书中，他是虔诚者路易同时代的人并与其一同擢升。至于随后的史事，由于我已经参与了许多宫廷事务，

①Matthew Innes and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s.,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10.

故而，可以把我所见和所了解到的书录成史。”^① 不过，王 / 皇室对于修史活动的支持也有其负面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官修史书和官方认可的史书多带有明显的党派倾向性。如“天文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明显偏袒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对罗泰尔则痛加谴责。

第六，具有古典气息的历史著作在加洛林时代重新涌现

在5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的拉丁化西方，历史著作的古典传统已经衰落，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沾染了过多的宗教色彩，最明显的是圣徒传，圣徒传的作者往往把主人公拔高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而人物的活动或性格特征反倒退居次要地位。而到了加洛林时代，由于国势强盛以及王 / 皇室对于文化事业的扶植，法兰克王 / 帝国的文化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复兴古典文化的热潮，许多古典时代的历史作品被重新发掘了出来，现今绝大多数拉丁文的古典史学著作是以加洛林时代的抄本为底本整理出来的，受这股热潮的影响，加洛林时代的著述家们修撰了若干具有古典气息的史学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查理大帝传》散发着浓郁的古典气息，是爱因哈德模仿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十二凯撒传》（*The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中的《奥古斯都传》写成的。在《查理大帝传》中很少基督教史书中常见的迷信，在爱因哈德的笔下，查理曼是一位有血有肉、亲切感人的帝王。可见，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的角度审视，加洛林时代都是西欧中世纪史学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也是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形成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限于语言、史料等众所周知的原因，长久以来，国内学界在此领域虽非毫无成就可言，但其总体成就和水平实在是不尽如人意，过于薄弱，突出表现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稀少。如戚国淦依照英译本翻译了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和圣高尔修

① Thomas F. X. Noble, *Charlemagne and Louis the Pious: The Lives by Einhard, Notker, Ermoldus Thégan and the Astronomer*,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ark: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28.

道僧的《查理大帝传》，张广智、郭小凌、郭圣铭、夏祖恩等在西方史学史专著中概括性地论述了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史，并对加洛林时代重要的史家——爱因哈德、尼萨德及其史学作品予以了初步介绍。这些专著并未设置独立的章节，深入详实地介绍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史。恕笔者鲁莽地揣测，这一现象可能与著者们的写作主旨有关，由于它们多以“西方”、“外国”为题名，着眼的是西方世界或整个人类世界古今几千年来的史学发展和进步，在谋篇布局上自然不会给予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史以太多的写作空间。所以，在国内的专著中，一般只是在叙述中世纪史学史的章节中零星地提及加洛林时代几位代表性的史学家及其著述，不过，这些成果对于认知西方史学史中世纪时段的全貌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开拓和启示价值。

国外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外学者首先从大规模整理加洛林时代的历史文献入手，使他们的研究建立在翔实而厚重的史料基础之上。在中世纪盛期的西欧，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并没有湮没无闻，但是直到公元16世纪，欧洲人方才对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展开正规性的研究。当时，由于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法国、德国兴起了研究加洛林历史的热潮，一大批新教史学家为了论证尚不成熟的新教教义和政治主张，竭力从中世纪历史，尤其是加洛林时代的历史中寻找论据。此外，16世纪法国史学界研究加洛林历史的热潮还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学术批判思想传入了法国，法国史学界深受其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尤数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校勘法及哲学思想。16世纪法国的王权逐渐走向强大，对于当时法国的某些史学家而言，查理曼不仅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且还是法兰西强大王权的首创者，在他们看来，正是查理曼使法国的封建习俗制度化并开创了世俗君主限制教皇权力的先例。法国的某些史学家往往将当时的法兰西国王看成是查理曼权力的继承者。例如1552年史学家查尔斯·杜默林（Charles Dumoulin）在上呈国王亨利二世的一道奏折中写道：“众所周知，卓越、公正、睿智的查理曼……虔诚者路易……直至陛下，历代君王佩戴的是同一顶冠冕，所

掌握的权力和权威亦别无二致……”^① 故此，某些法国史学家出于为当时强大的王权提供历史依据的考虑，纷纷致力于加洛林历史研究。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唯有掌握准确翔实的史料，方能得出正确合理的结论。但是当时加洛林历史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却是史料问题，由于年代久远、版本繁杂的缘故，许多原始史料残缺不全且歧义、阙文丛生，加洛林历史研究者在研究时往往无所凭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6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史学界掀起了编辑整理加洛林时代原始史料的热潮。第一位对加洛林时代的原始史料加以编辑整理的人是法国史学家纪尧姆·佩蒂特 (Guillaume Petit)，他是一位来自诺曼底地区的多米尼修会的修士。在法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佩蒂特担任了布洛瓦 (Blois) 王家图书馆的馆长，1509年他又担任了国王路易十二的忏悔神父，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加洛林时代的一些原始手稿。佩蒂特编辑整理了《维埃纳的阿多编年史》(于1512年出版于巴黎) 和执事保罗的《伦巴德人史》(于1514年出版于巴黎)。德国的史学家也不甘人后，赫尔曼·冯·诺伊纳尔 (Hermann von Neuenar) 编辑整理了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于1521年出版于科隆)。塞巴斯蒂安·冯·罗坦奥 (Sabastian von Rotenhau) 编辑整理了《普鲁姆的勒斋诺编年史》(于1521年出版于美因兹) 和《利雪的弗莱库尔夫编年史·下卷》。^②

16世纪法国、德国史学家编辑整理加洛林时代原始史料的工作意义重大，因为这一工作使一大批原始的手稿得到了挽救并为后世的研究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史料。但这一时期的编纂工作纯属史学家个人的行为，没有一个组织机构从中统筹规划，因而编纂的史料数量颇为有限，并且由于缺乏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这一工作很快停顿了下来。直至19世纪初，欧洲方才出现了系统化、组织化的大规模编纂中世纪原始史料的事业——编纂《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①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study of Frankish history in France and German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s., *The Frankish Kings and Cultur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ldershot: Variorum Ashgate, 1995, p. 558.

②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study of Frankish history in France and German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s., *The Frankish Kings and Cultur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ldershot: Variorum Ashgate, 1995, p. 562.

Germaniae Historica)。《德意志史料集成》是一套有关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史料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500至1500年的重要史料,由年代记(*Scriptores*)、律法(*Leges*)、宪章(*Diplomata*)、书信(*Epistolae*)、与古物学有关的文献(*Antiquitates*)五个部分组成。1819年普鲁士的斯泰因男爵创立了专门编纂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史料的机构——“德国古代史料研究会”(Gesellschaft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1823年斯泰因男爵任命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佩茨(*Georg Heinrich Pertz*)为研究会的主编,自此之后,编纂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史料的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佩茨最先编纂的是查理曼时期的史料,1826年8月14日《德意志史料集成》年代记部分的第一卷《加洛林时代的年代记和编年史》(*Annales et Chronica aevi Carolini*)出版。1829年12月,佩茨又出版了年代记部分的第二卷,第一卷和第二卷总计1500页,其中一些重要的原始史料,如《克桑滕年代记》(*Annales Xantenses*),是由佩茨首先发现的,而加洛林时代的某些原始史料,如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已被前人编辑整理,佩茨在此基础上对其文本内容作了较大改动,后世的评论家虽然在全文各处仍发现了不少的错误,但总体上对佩茨的改动赞誉有加。经过佩茨的努力,加洛林时代绝大多数的年代记和编年史得到了编辑整理,这为德国史学家研究加洛林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正是由于《德意志史料集成》编纂事业的推动,德国的中世纪史研究在欧洲同仁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即使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也未能动摇这一领先地位。

相较于法国和德国,英美史学界并没有大规模编辑整理加洛林时代原始史料的历史,这一现象并非偶然。首先,英伦三岛在历史上并不是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领土,因而英国存有的加洛林时代原始手稿的数量远逊于法、德两国,美国存有的原始手稿则更少。其次,法国人、德国人视法兰克人为自己的祖先,两国史学家往往出于抒发爱国情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而编纂加洛林时代的原始史料。例如,斯泰因男爵倡议编纂《德意志史料集成》的直接动机是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斯泰因男爵的女儿黛蕾丝已长大成人,斯泰因觉得女儿应接受

正确的民族史教育，但在为女儿寻找德意志民族史料的时候，斯泰因发现根本没有印好的资料，于是，他决定编纂《德意志史料集成》，以便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看来，加洛林时代的历史只不过是一段异族的历史，因而研究这段历史的热情远不及法国人和德国人。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学者才开始将法德学者编辑整理过的加洛林时代的原始史料翻译为英文。1890年美国学者S. E. 特纳（S. E. Turner）将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译为英文。1906年美国学者威廉·达德利·福克（William Dudley Foulke）将《伦巴德人史》译为英文。1922年英国学者A. J. 格兰特（A.J. Grant）将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以及圣高尔修道僧结舌者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译为英文。自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为满足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中世纪研究者对于中世纪原始史料的企盼，推出了曼彻斯特中世纪史料系列丛书，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英译的中世纪史料，其中加洛林时代的原始史料有：英国学者珍妮特·拉夫兰德·尼尔森翻译的《圣伯丁年代记》（1991年出版）、蒂莫西·罗伊特翻译的《富尔达年代记》（1992年出版）、西蒙·麦克莱恩翻译的《普鲁姆的勒斋诺编年史》以及马格德堡的阿德尔伯特为其续写的续编（2009年出版）。

在译介加洛林时代原始历史文献的同时，英美学术界对于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史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偏重于微观具体问题，学者们往往从一本历史文献入手，深入挖掘该文献背后所反映的史学编纂、作品体例、史观、史学传统以及历史文献原著作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理念和主张等。如麦基特里克特的《加洛林世界的历史和记忆》、《中世纪早期对于往事的构建：以〈王室法兰克年代记〉为例》、马修·英尼斯和麦基特里克特合撰的论文《历史的创作》、尼尔森的《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宫廷中的史学著作》、《尼萨德著作中的公共史和个人史》、达米恩·肯普夫的《执事保罗的〈梅斯历代主教传〉和梅斯主教区在加洛林王国中的地位》、西蒙·麦克莱恩的《普鲁姆〈勒斋诺编年史〉中的讽喻、审查以及加洛林王朝晚期对于罗塔凌吉亚地区的争夺战》等。然而，从宏观层面，分析、评价、把握加洛林时代历史编纂学整体发展状况的学术成果却不多见。据本人所查找到的研究成果来看，